

# 天問新注

程嘉哲 注释



2.3

程嘉哲 注释

# 天问新注

1

天 问 新 注

程嘉哲 注释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七二三四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960毫米 1/32 印张8 插页2 字数133千

1984年8月第一版 1984年8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5,100册

书号: 10118·667

定价: 0.82元

四川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四年·成都

---

## 目 录

试论《天问》的艺术性和思想性（代序）

..... ( 1 )

天问..... ( 13 )

天问 异文校订  
古音叶韵 表..... ( 219 )

# 试论《天问》 的艺术性和思想性 (代序)

《天问》是我国古代最伟大的诗人屈原继《离骚》之后的又一部光辉著作。由于它写在诗人对社会有了深刻的认识，创作技巧又受到了最充分的锤炼的晚年，所以它的思想性、文学性都极高。如果把作者举世闻名的《离骚》比作一颗光焰夺目的隋侯明珠，那么，这首长期被误解淹没着的《天问》，则是一块不易为人鉴识的荆山璞玉。它一旦显露晶莹，就可以看出真是当之无愧的传国至宝。

这是一首很奇特的诗，清代有位注释家曾形容说：“其创格奇，设问奇，穷幽极渺奇，不伦不类奇，不经不典奇……奇气纵横，独步千古”（《屈骚心印》）。的确，这首诗别居一格，非但在中国古代文学宝库里，而且在世界文学宝库里，都是独一无二，不可再得的珍品。它全部由问语组成。诗中将近一百七十个提问，几乎每问都包藏着一个十分有趣的神话或传说故事。凡天上、地下、鬼神、

人事、远方奇物……无所不有，无所不问。其中不少资料还为他书所不载，仅赖本诗才得以保存下来。有人把《天问》称做我国古代神话传说的总集，其实本诗的价值远不止此。只要看这一首满是提问，所有的问题作者既未给予解答，又毋需解答的古怪作品，竟能流传两千年之久，而且还一直吸引着无数学者穷毕生之力以探索其中之奥秘，就知道它的内容何等丰富，何等动人了！

许多人毕生钻研《天问》，却又毕生一无所获。他们正像《屈子贯》描写的那样：“如入宝山，瑰玮璀璨之弥目，而不识何物；如聆广乐，铿锵杳渺之盈耳，而不解奚响……而无以解之，则亦终无以解之矣！”是不是《天问》的文字艰深，十分费解呢？不！恰恰相反，这是一首用当时最流行的格式和最通行的口语写成的诗。屈原的作品虽有“烂漫的春光似的辞华”（郑振铎语），总的说来，并不比别的先秦作品拗口，而是平易得多——这首诗尤其如此。其中很多句子，几乎只要稍加改动，便成了俏皮的现代诗句。由此可知作者决不是务求怪僻，故弄玄虚之辈。然则是不是《天问》用典生疏，因而难懂的呢？这首诗里确实有些“不经不典”的掌故，但这些掌故一般还能从秦、汉杂家著作如《吕氏春秋》、《淮南子》，以及神话书如《山海经》中找到。这类书所记，大都是当时的民间俗说，尽人

· 皆知的东西。正是这一点，更能证明作者写诗的时候，是立意使它通俗化的。至于有些故事情节残缺，· 则只怪秦始皇放了一把邪火，烧掉了许多古代文献。· 不过这类故事到底是极少的一部分，现在即使在古籍中完全找不到，而仅见于本诗的故事，也于出土文物中发现了线索，因此已不能把这一点作为理解本诗的障碍了。

《天问》是一首最有层次，结构得最好的长诗典范。宋人黄伯思就赞叹过《天问》的“词严义密”，王夫之更具体地说“篇内事虽杂举，而自天地山川，次及人事；追述往古，终之以楚先，未尝无次序存焉”（《楚辞通释》）。综观全诗，从开头到高潮，直至收尾，有关全篇布局固然经过细致安排，就连一些小处，由于诗中每一节包含着独立的故事，每一段都有独立的中心，因此它们怎样和上文衔接，怎样为下文预设伏线，作者也都花费匠心，给予了巧妙的处理。屈原把这样一首诗写得龙变云蒸而又神联意贯，仅仅他在这方面留给我们的范例，就是一笔难得的财富。至于诗中有些时代较晚的故事先问，时代较早的反而后问；有些故事同属一个人或一个朝代，而分散作几次在不同的章节中发问，则完全是服从内容的需要。此即林云铭所说的“错综衬贴，反击旁敲，原不分事迹之先后。点染呼应，步步曲尽其妙”（《楚辞灯》）。辑订楚词的王逸认



为《天问》是屈原看见庙里的壁画，按图发问，集而成篇，所以“文义不次序”（《楚词章句》），固然是妄说；胡适认为“《天问》文理不通，见解卑陋，毫无文学价值”（《读楚辞》），固然是对祖国这一宝贵文化遗产的无耻诋毁；有些人掇拾屈复《天问校正》的牙慧，硬把一部完完整整的罕见杰作说成有“错简”，而要另行按故事顺序编排一番，以至使这首战斗性极强的政治哲理诗，一变而成了庸俗的历史弹词，也只能表明他们对此诗一窍不通。

《天问》的文字既非特别难懂，用典也并不全都生疏，结构又很有层次，那么，为什么王逸说早在东汉时代，“屈原所作，凡二十五篇（？），世相传教，而莫能说《天问》”呢？为什么那赫赫的宋代大儒，考亭学派的宗师朱熹，注《天问》竟囫圇吞枣，知道的说几句，不知道的就斥为“荒诞”，一笔带过呢？为什么不少楚词注家索性放弃《天问》不注呢？原因只有一个，也很简单：他们不理解屈原，尤其不能理解写《天问》时的屈原的叛逆思想。

把“叛逆”两个字和屈原联系在一起，是会使许许多多人大吃一惊的。班固说了一句屈原“露才扬己”，就惹得从汉代以来无数学者大发雷霆。屈原的忠臣形象从来是碰也碰不得的。在那些人看来，

说屈原不忠，就是对这位可敬的诗人的莫大侮辱。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指出：在阶级社会里，“统治阶级为了反对被压迫的个人，”把符合统治阶级存在条件的观念形式，强行“提出来作为生活准则”，例如“在贵族统治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是忠诚、信义等等概念”（见《德意志意识形态》）。我国“忠”字最先是在殷奴隶王朝的文献中出现的。殷朝亡了，贵族统治并没有消灭，因之它长期被利用来作为反对被压迫者的手段。只要弄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就不难知道：保护屈原的忠臣形象，其实是为了贵族统治的利益；他们的目的，不过是要借这位受到广大中国人民热爱的诗人的金身，来装点自己的殿堂而已。

把屈原说成忠臣，其根据大概是屈原主张抗秦，遭谗被贬，始终不离开楚国，最主要的还是他写的诗里，“其存君兴国，欲反复之。一篇之中，三致意焉”（《史记·屈原列传》）。屈原任楚怀王左徒，曾经很受信任，后来贬在汉北，写的《抽思》确实充满着对楚王朝的怀念；顷襄王继位，他任三闾大夫，也确实是由于受亲秦派排挤，而不能在郢都呆下。不过，这都是早年的事情。屈原出身于贵族，与楚王同宗，早年完全站在贵族的立场，满脑子符合贵族利益的“忠诚、信义”是理所当然的。至于他主张抗秦以及始终不肯离开楚国，则并非出

自狭隘的忠君思想。就以《抽思》为例，诗人在描述自己“心郁郁之忧思”时说：“欲摇起而横奔兮，览民尤以自镇”，从这两句诗里，我们看到的是一颗比忠实臣仆高贵得多的心灵。他爱国，但他所想到的是苦难深重的楚国老百姓。只有具备这般胸怀，作者后来转向人民才是可能的。

屈原放弃三闾大夫的高位，毅然从郢都出走，是他转变的开始。当时他写过一首题名《惜诵》的诗，除了篇首表白自己曾经“竭忠诚以事君”外，随后就全在谴责楚国贵族统治集团内部的勾心斗角。作者一方面把楚国小朝廷形容为“矰弋机而在上兮，罟罗张而在下”，处处设有陷阱的恐怖世界；一方面把自己比作“九折臂而成医”，跌交跌出了经验的人。他的心气就和写《抽思》时的“望南山而流涕，临流水而太息”大不相同了！如果说这时候屈原“愿曾思而远身”，只是有些灰心，还没有与楚王朝彻底决裂，那么，稍后他便这样做了。这位富于正义感，观察力极敏锐的大诗人，脱离原来的生活圈子，在江夏一带住了一段时间，与人民有了较多的接触，思想马上起了剧烈的变化。他这时写的《思美人》，曾用“令薜荔以为理兮，惮举趾而缘木；因芙蓉以为媒兮，惮褰裳而濡足”作比喻，申明哪怕像爬上树去或涉入浅水去摘取花朵一般容易，就能与朝廷达成和解，他也不屑于为此而举足

一上，或撩起衣裳，弄湿双足。这是多么坚定的誓言呵！

离开江夏，诗人“独茕茕而南行”（《思美人》）。他渡过长江，沿洞庭湖西岸，上溯沅江，到辰阳停留了些日子，然后去苍梧凭吊舜迹，再顺湘江而下，绕道到了洞庭东岸的汨罗。这一次漫游花了几年光阴，途中留下的诗作有《涉江》、《怀沙》等篇。在这些诗里，屈原把楚王轻蔑地称作“南夷”（见《涉江》），诅咒在他的统治下，“变黑以为白，倒上以为下”（见《怀沙》），还大胆地歌颂了伍子胥（见《涉江》及《惜往日》）。众所周知，伍子胥是楚国的叛逆，他为惩罚荒淫凶残的楚平王，竟把这个暴君的尸体从坟墓里挖出来，抽打了三百鞭子。这个敢于对国王狠狠地进行报复的英雄，在民间是被当成偶像来崇拜的。屈原讴歌这样的人物，他与人民的思想感情有了何等程度的接近，是一目了然的了。

舜这位传说中的古代圣君，实际是我国原始共产社会——“大同盛世”的人民领袖。这是屈原时代有些学者已经认识到了的（见《礼运》）。诗人出于对“天下为公”的平等社会的向往，老远跑到苍梧去瞻仰舜的墓葬。这次旅行的结果，使他痛感“重华不可遇”（《怀沙》）。舜的时代不会再回来，使他绝望到要“遂自忍而沉流”（《惜往日》），

投水自杀。作为一个诗人，“不毕词而赴渊”，会“使芳草为薺幽”（同上），他意识到就这样默默地死去，正义永远不会申张。基于这种对社会的高度责任感，他才打消死的念头，回到郢都，继续他宏伟的创作事业，终于为我们写下了不朽的《离骚》。这首诗反映了作者一生的经历。诗中主人公从“恐皇舆之败绩”到“悔相道之不察”的过程，正是诗人自己从忠心耿耿维护楚王朝统治，走向背叛这个统治集团的觉悟过程。这首优美绝伦的诗篇虽然写得非常含蓄，但它把人间的帝王、天国的主宰，一概否定。发出“哀高丘之无女”的叹息，就表明作者此时对君主专制已经深深地憎恶。与以前只抱怨楚王的昏聩相比，他在思想上又大大前进了一步。

《离骚》写成不久，郢都为秦将白起攻破。旧的吸血鬼们丢下老百姓不管，仓皇逃去；新的吸血鬼们带领着大批军队，一路烧杀而来。年过五旬的诗人杂在乡亲们之中，“遵江夏以流亡”，亲眼看到“民离散而相失”的惨状，不禁发出“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愆”（以上《哀郢》）的愤怒责问。他问老天爷何以不安好心，要把人间的统治权交给这些坏人，让老百姓遭到浩劫？诗人责问天，并不是真正相信天命，只表示他有压抑不住的愤懑。

《天问》这首不世出的伟大诗作，就是屈原在国破

家亡。“上洞庭而下江”（同上）的流亡期间，怀着满腔激愤写成的。把这样一首诗，还当作是“忠不见信，冤莫能白”的“孤臣孽子”式的屈原写来“寒乱臣贼子之胆”的（见陈本礼《屈辞精义》），岂不可笑！

关于本诗，注家们有许许多多的争论。首先篇名“天问”应作何等解释，就是一个讨论的焦点。其实“天”字本身含有神秘和不可知的意思。古代词性区分不严，动词常作名词用，“问”可当问题讲。这首诗讨论的是君主制的弊害，诗中很多话说穿不得，只好委之于“天知道”。天知道的问题，不叫“天问”，又还能叫什么别的呢？

《天问》虽有问无答，但屈原并不是个怀疑论者。他承认“天式从横”，认识到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客观真理，以及诗中处处表露出来的唯物精神，就是证明。故意披着一件怀疑主义的外衣，对作者说来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全诗三百七十四句，就内容可以分为四章和一个尾声。首章先问开天辟地神话的来源，接着问天体构造，天上的诸神，以及大禹重建陆地的神话，地上的种种神迹，四方的种种灵异。这一章把人带进的是一个光怪陆离的宏观世界。在这广阔无垠的宇宙中，充满了人类童年时代极其智慧而又极其幼稚的幻想，因此它一开头就非常吸引人。就是这个开头，便有力地摧毁了王

权神授的基础。第二章是把问题从天事引向人事的过渡。它由大禹、后羿等降凡的故事以及嫦娥等升天的故事组成。诗人向读者暗示：从天上下来的救世主是没有的，人想超凡出世也是不行的。生活在这个世界，只有面对着这个世界的现实。第三章是全诗的核心，它又分为两个部份。前一部分借虞、夏、商三代的所谓圣君、贤主，以及吴太白等人的故事，以驳斥统治者是天生的贤人和贵人的说法。后三段则是一部绘声绘色的帝王家谱。它把一个剥削家族怎样逐步上升，怎样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便野心勃勃地夺取政权，他们的子孙又是怎样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都作了具体、细致的描写。第四章是作者对君主政治所下的总结。在屈原看来，专制帝王统治下的世界，是个一切被颠倒了，一切充满虚伪和矛盾，一切都在变化着的世界。尾声则是作者申述写作动机与发抒余感的部份。在这里屈原借谈楚国历史故事，说出了自己对行将覆灭的楚王朝的唾弃，“放言无惮”（鲁迅语），大胆已极。

恩格斯说：“古希腊的哲学家都是天生的自发的辩证论者，他们中最博学的人物亚里士多德就已经研究了辩证思维的最主要形式”（《反杜林论》）。恩格斯又说：“我们在卢梭那里不仅已经可以看到那种和马克思《资本论》中所遵循的完全相同的思想进程，而且还在他的详细叙述中可以看到马克思

所使用的整整一系列辩证的说法。按本性说是对抗的、包含着矛盾的过程，每个极端向它的反面的转化，最后作为整个过程的核心否定的否定”（同上）。《天问》就其本性来说，也是符合辩证法则的。不过屈原在这首诗里虽然揭露了许多矛盾，却唯独没有揭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根据《天问》的逻辑，好像只要消灭了君主专制，人类就会幸福了似的。我们知道，仅仅着眼于上层建筑，社会问题是得不到彻底解决的。不过，我们应该历史地看待屈原的作品。作者生活在两千多年前，我们决不能用古人不可能达到的尺度来衡量他。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的引论草稿中，曾把亚里士多德称作“古代世界的黑格尔”，又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把卢梭称作“非常革命”的“伟大人物”。我们把屈原看成是中国古代的卢梭，称他为“非常革命”的伟大诗人，大概是不为过份的。

屈原的时代，是各阶级、各阶层的代言人都在竞相发言的百家争鸣的时代。在那个时代出现他这样伟大的诗人并不是偶然的。迺后的两千多年，我国进入的是一个思想统治极其严酷的封建社会。注家们既不敢正视屈原作品中的革命性，又受形而上学思想方法的约束，其不理解《天问》也是势所必然的。但是，就在这两千年中，不少学者星星点点



的发现，也是非常有益的。尤其以来代的洪兴祖、清代的蒋骥，下的功夫最深，提供的线索最多。这些成果为我们运用科学方法弄懂这篇伟大著作铺平了道路，这些人的功劳都是不可磨灭的。

本诗注释工作一开始，就遇上了十年动乱，我的私人藏书被抄没，后因重新搜集参考资料困难，旷时费日，所以直到一九七七年七月才脱稿。给《天问》作注释而要使全篇贯通，是十分艰难的，现在只作为个人的学习心得整理问世，还希望专家、读者多多指正。

程嘉哲

1982年1月7日写于北京